

## Revisions to the Exhibition about CPC History in 1979

## 1979年“党史陈列”的修改历程

刘建美 Liu Jianmei

148

## 内容提要：

1970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在原“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修改“党史陈列”。此后,“党史陈列”经过数次修改,反复审查,历时9年多,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198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又对“党史陈列”进行了充实和修改,直至1988年1月结束开放。梳理“党史陈列”的修改过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目前博物馆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关键词：

中国革命博物馆 党史陈列 修改 审查

**Abstract:** In August, 1970,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Revolution began to revise the original exhibition about Chinese revolution in preparation for the exhibition about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revisions and censorship took more than nine year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ped up this process. On October 1, 1979, the new exhibition opened. It was closed in January, 1988. A retrospective research on the revisions of this exhibition offer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oday.

**Key Word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Revolution; exhibition about CPC History; revision; censorship

1970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sup>[1]</sup>开始在“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筹备和修改“党史陈列”(即1921-1949年党史陈列,又简称28年党史陈列)<sup>[2]</sup>。期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各级领导、专家和相关单位人员的反复审查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党史陈列”经数次修改,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1981年,为迎接建党6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又对“党史陈列”进行了充实和修改,直至1988年1月21日结束开放。“党史陈列”的修改历时9年多,展出时间长达9年,其过程可称得上是近现代基本陈列筹办和修改的典型。

## “左”倾思想指导下“党史陈列”修改的曲折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1月30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闭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全面展开,林彪集团加紧“抢班夺权”。在此形势下,1970年8月,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sup>[3]</sup>提出业务整改部署,要求中国革命

博物馆 1971 年上半年搞出陈列, 向党的五十周年献礼。当时, 全馆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下放“五七”干校, 留馆人员大部分时间进行斗、批、改, 开办讲用会和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全馆的业务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接到任务后, 留馆职工经过反复酝酿讨论, 考虑到原有的工作基础, 建议先集中力量搞 28 年党史陈列。随之, 经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同意, 留馆人员着手在原基本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改为“党史陈列”。为完成这次修改, 中国革命博物馆从中央党校、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借调了大批干部支援陈列的修改。

1970 年 9 月 17 日, 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图博口领导小组的会议上, 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干部、时为图博口领导小组成员的罗歌向他反映关于筹组“廿八年党史陈列”的设想, 总理当即表示: “搞廿八年, 几个阶段, 一条红线。搞廿八年, 《毛泽东选集》四卷可以作为依据, 你们搞搞看。”<sup>[4]</sup>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 留馆人员加紧陈列的筹办和修改。1971 年 6 月, 经过修改后的“党史陈列”摆出大样。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 这次陈列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 在陈列内容上有一定的问题, 它违背了历史, 过分地突出了林彪。

陈列初步就绪后, 1971 年 6 月 27 日,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图博口主要领导成员时指出: “党史陈列”不要内部预展, 要好好学习即将发表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即“七一”社论), 并请中联部、中组部、中央党校参加讨论和制订修改方案<sup>[5]</sup>。与此同时, 六七月间, 邓颖超 5 次来馆审查“党史陈列”。她提出: “你们收集的材料非常之多, 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没有重点, 关键问题不突出。她一再强调“展出要符合历史”; “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定要严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办事, 不能想怎样办就怎样办。”“美术作品不能代替当时的历史文物照片。”“你们的陈列, 一定要采取群众路线, 经过群众提意见, 不断修改, 把党史陈列搞的好上加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 要长期搞。”<sup>[6]</sup>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 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 中国革命博物馆检查了“党史陈列”中突出林彪的问题。1972 年, 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职工陆续回馆, 各项业务工作逐渐恢复。同年下半年, 根据“批林整风”运动中检查所发现的陈列中的问题和邓颖超等的审查意见, 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修改“党史陈列”。这次修改的重点是体现“路线是个纲”和两条路线斗争, 在陈列中处理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系, 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把握<sup>[7]</sup>。1973 年春节, 修改后的“党史陈列”布展完工。1973 年 2 月, 几位馆长和著名党史专家胡华、佟英明及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进行了初步审查。

1973 年 8 月, 党的十大召开。根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馆领导和专家审查的意见, 特别是根据党的十大精神, 1973 年 10 月下旬, 开始第三次修改“党史陈列”。在此修改过程中, 1974 年初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 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再次检查了“党史陈列”中突出林彪的问题。这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依据, 以路线为纲, 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红线。为更好地贯彻执行“突出红线”的方针, 第三次修改尤其注意突出表现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 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团结胜利的路线, 处理好出现人物的问题和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修改后的陈列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个历史时期。陈列面积4000平方米<sup>[8]</sup>。

在第三次陈列修改的同时，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人带着问题，分头到各地博物馆进行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征集文物资料。同时，配合陈列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摸清、挑选馆藏文物。这样，内外结合，提高修改质量，加速工作进度。

尽管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党史陈列”既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又不能及时跟上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甚至配合政治运动而随意篡改历史和文物。由于陈列本身的缺憾和历史时机的不成熟，至“文革”结束时，“党史陈列”仍没能对外开放。

“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和行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中国革命博物馆对“党史陈列”又作了一次检查和修改，进一步剔除了林彪、“四人帮”路线的影响。1977年2月，“党史陈列”又一次修改完毕。修改后的党史陈列，除将原作为背景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材料移至“中国通史陈列”外，仍按历史顺序，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时期，基本上保持了1961年陈列的体系，但对陈列内容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充实，主要是：进一步充实了有关毛泽东的文物，使红线更为突出；用正反对比的手法，增加了揭露、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逆流的材料；在突出表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同时，也表现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陈列结合历史事件，共出现各时期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51人、著名革命烈士76人、党外人士27人。陈列中出现人物的总数，比“文化大革命”前稍有增加。整个陈列共有展品3300多件，陈列面积4000平方米<sup>[9]</sup>。



图一 1977年7月12日，邓颖超来馆审查“党史陈列”时与本馆工作人员合影

1977年3月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协助审查。3月29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指示：“请组织少数人先看一下，提出意见报中央政治局再议。”<sup>[10]</sup>遵照华国锋主席的指示，4-11月，国务院邀请乌兰夫、徐向前、陈云、谭震林、李井泉、邓颖超、江华、粟裕、罗瑞卿、宋任穷、张平化、江渭清等十多位老同志和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宣传口、中联部、统



图二 1977年9月26日，陈云来馆审查“党史陈列”时与本馆工作人员合影

战部、中央党校、外交部、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10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审查“党史陈列”（图一、二）。根据审查意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对“党史陈列”进一步作了修改。

“文革”结束之初，与整个国家形势相适应，虽然陈列修改工作有所前进，越来越科学、形象地反映党的历史，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党史陈列”的修改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束缚。“文革”中许多错误的理论、政策、口号以及对人物的结论等仍具体体现在“党史陈列”中，因此陈列的修改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进展，陈列仍没能对外开放。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陈列”修改的突破及开放

1978年5月，全党开展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果断地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党史这个禁区有了很大突破，提出了许多过去不敢接触的问题，有些问题已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此形势下，应广大群众开放“党史陈列”的强烈要求，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展览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突破禁区，加快“党史陈列”的修改。由



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随着全党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以及党史研究领域里一些禁区的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陈列”的修改有了质的突破，质量上产生了一次飞跃。

在新形势下，修改后的“党史陈列”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整个陈列的基本原则是：第一，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教导是党史陈列的基本原则。凡是既成的事实，都必须尊重；反映历史事实的文物、资料、照片，都不能任意修改。第二，要用历史唯物论的原则，正确表现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要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正确表现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正确表现党的领导集体。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又指导实践的。“党史陈列”要用史实正确表现这个过程，不要简单地用毛泽东的著作或语录来代替这个过程。第四，党史是党领导革命人民向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进行英勇战斗的历史。党内的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不要以“路线斗争史”代替阶级斗争史和党史。在党内斗争中，要区别路线错误和一般错误。无论是一般错误或路线错误，都不要无限上纲。要根据历史事实给予恰当的评价。第五，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从历史上抹掉。第六，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七，“党史陈列”要少而精，不搞烦琐哲学。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党史主流、重大事件；在陈列品选择上，要重质量。各种文字说明都应减少到必要的程度<sup>[1]</sup>。

在上述陈列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新的陈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国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新的陈列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党史领域中存在着的一些禁区，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党的历史。如关于党的创建人，过去的陈列对李大钊、蔡和森、董必武等表现得很少，只字不提陈独秀，现在除充分反映毛泽东的建党活动以外，增加了其他党的创建人从事建党活动的资料。对在党的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过去只是单纯地揭露和批判。新的陈列采取分析态度，不否定一切，既批评他们的错误，又表现他们的正面活动。如适当表现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八七会议和文化反“围剿”中的作用，但批判他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误；适当表现李立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批判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新的陈列否定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党史就是路线斗争史的谬论，注意充分表现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图景。同时，对党内存在过的路线斗争也如实作了反映。新的陈列充实了白区斗争的史料，对民主革命时期有影响的党外人士，如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结合历史事件均有所记录。新的陈列出现革命烈士100余人，其中除了共产党员以外，还包括不少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

新的陈列布置好后，1978年6月9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又向中共中央报告有关单位审查及修改情况，建议开放“党史陈列”。12日，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批示：“是否正式开放前，再请中组部、中央党校、毛著办公室、总政等领导同志审核一遍。”<sup>[12]</sup>7-9月，邓颖超来馆审查，胡乔木、黎澍、李新连续11次来馆逐段审查，中宣部、中组部、中央党校、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总政治部、中国社会科学院6单位领导和专家审查“党史陈列”。

1979年7月24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就“党史陈列”开放之事，又一次请示中宣部，请求于十一国庆前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后即正式开放。8月1日，中宣部批

准国家文物局的报告，朱穆之副部长批示：“为慎重起见，是否请胡乔木同志、中办、党校、毛著办公室、总政、军科院、社会科学学院的负责同志和比较有研究的同志一起看一下，耀邦同志能去更好。开馆时是否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也请耀邦同志决定。”<sup>[13]</sup>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批示：“同意再请一些同志去看看，尽可能避免出漏洞。但形式上不宜搞得太‘神圣’，太严肃，因为这样想，这样作，人们的挑剔就没完没了了。这方面也要解放点思想。”<sup>[14]</sup>8 - 9月，根据中宣部领导的批示精神，中国革命博物馆又一次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老同志、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党校、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办公厅、中央编译局、中央档案馆、北京18所大专院校、20个新闻单位、全国65个博物馆和纪念馆负责同志审查“党史陈列”。审查者基本肯定了这个陈列。9月17日，邓小平在本馆送审的“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上亲笔批示：“参加遵义会议名单是确切的。八七会议名单，大体差不多，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李维汉同志知道清楚些，他当时是中央秘书长，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可问问他本人（也可能他在八七会议之后才到中央工作，我记不清楚了）。”<sup>[15]</sup>

经过反反复复的审查和修改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79年10月1日，在国庆30周年之际，修改了9年多、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陈列”正式开放。

“党史陈列”开放的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时事社、共同社等国内外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9月27日，新华社电讯称：“新的陈列内容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党史领域中存在的一些禁区，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党的历史。”<sup>[16]</sup>时事社报道：“一九六六年以后一直关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在相隔十三年之后于一日重新开放了。那里已挂出几张已故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照片。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党史陈列室还挂出了已故的党的副主席林彪和建党时期的领导人、后因和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发生对立而被打倒的王明、陈独秀和博古等故人的照片。这表明中国将采取新的政治姿态，即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历史事实客观地对待党史。”<sup>[17]</sup>共同社报道：“党史陈列馆中，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原副主席林彪的出现，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忠实于史实的方针搞的，象征着建国三十周年到来的中国现代政策。”<sup>[18]</sup>

“党史陈列”开放以后，参观群众十分踊跃。据不完全统计，10月1日至10日共接待观众12万人次，最多一天达17000人次<sup>[19]</sup>，到10月底共接待观众59.3万人次，最多的一天达5万人<sup>[20]</sup>。观众对重新开放的“党史陈列”反映非常热烈，“普遍认为新的‘党史陈列’内容丰富，恢复了党史的本来面目，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党史领域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一个新气象”<sup>[21]</sup>。历史学家任继愈来信说：“看了党史展览，我们这里的几位老同志都觉得你们思想解放了，开始恢复了我党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好传统。”<sup>[22]</sup>

1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建党60周年的通知》，其中，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修改充实后重新开放，被列为纪念活动项目。根据中央精神，中国革命博物馆在1979年展出的基础上，吸取近两年来党史研究和文物征集的成果，从实际出发对“党史陈列”进行了充实和修改，新展出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

记录、林伯渠的《北伐日记》、陆定一的《长征日记》、关向应和聂荣臻早年写的家信,以及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革命危难关头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热爱祖国、坚持革命的文物和照片等。经过充实和修改后,“党史陈列”于1981年7月1日再次展出。对此,《文汇报》发表文章称:“经过充实后的这次展出,在体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根本思想上,内容更加全面,材料更为充实。新增加的不少珍贵历史文献,突出地反映了党中央的活动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sup>[23]</sup>

直到1988年1月2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结束开放。

## 启示和思考

54

梳理“党史陈列”的修改和开放过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可以得到一些历史的启示,对目前博物馆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党史陈列”的修改历时9年,跨越“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时期,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明显反映在陈列的修改过程中,如刘少奇、林彪、陈独秀等人在陈列表现上的变化,“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等在陈列上均有所反映。这反映了“党史陈列”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一定程度上说,“党史陈列”的修改过程是这时期中国历史的生动、形象反映。

2. 为什么“党史陈列”历时多年反反复复修改?因为它曾扭曲历史,为错误政治服务。而1979年拨乱反正中完成的“党史陈列”,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陈列。它不仅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而且在舆论上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拨乱反正做出了独特贡献。这是当时我国博物馆发挥政治功能的一个高峰,充分体现出博物馆政治功能的价值。

3. “党史陈列”修改时间长、修改次数多,经过反复审查且参与审查和审批的人员范围广、层次高,陈列内容的修改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不可避免地又归结到多年来关于近现代历史类陈列的政治性和科学性、宣传性和学术性的讨论中。各种陈列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和宣传性,而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陈列则具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意味,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和宣传功能。党史陈列如何表现历史,如何在追求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处理和把握好政治性和科学性的问题等,仍是值得讨论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4. “党史陈列”的修改过程,反映了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党史陈列”是在“文革”前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筹办和修改的,具有一定的文物、人员和业务基础。修改过程中,针对业务人员的相对缺乏,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了大量专业人员和干部参与和支援陈列的修改,帮助提高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业务水平。针对文物的缺乏,配合陈列修改开展的文物资料的征集,进一步丰富了馆藏文物。同时,陈列的修改直接得到周恩来、邓颖超、华国锋、邓小平、陈云等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党史、现代史专家的支持,推动了博物馆的发展。

附记:本文的撰写得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沈庆林和研究馆员苏东海先生的指导。

注释：

- [1] 1969年9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在馆内，通史和党史的业务部门仍旧是分开的。在实际工作中，凡是属于办理通史业务的工作，对外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名义；凡是属于办理中共党史业务的工作，对外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名义。在本文中，根据惯用表述方式和为叙述方便，统称为中国革命博物馆。
- [2] 1921至1949年的党史陈列，也称28年党史陈列，在此统称或简称为“党史陈列”。但正式开放时，陈列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
- [3] 1970年5月，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办公厅直接领导，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工作。1973年2月，国务院撤销图博口领导小组，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革命博物馆分属国务院图博口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
- [4][6]《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博物馆陈列工作的指示》，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号197603608040002。
- [5][7][8]《二十八年党史陈列修改情况（供讨论用）》，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号197403608010003。
- [9]《函送吴德同志批示的文物局的报告 附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情况说明》，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 档号197703608040004。
- [10]《中央领导同志对审查党史陈列报告的批示（影印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号197703608040006。
- [11]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党史陈列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6期。
- [12]《中宣部对文物局关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号197803608010004。
- [13][14]《中宣部领导批示文物局关于审查党史陈列的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号197903608010008。
- [15]《小平同志审定批示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名单》，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号197903608010015。
- [16]《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国庆重新展出》，《光明日报》1979年9月28日。
- [17]《时事社说我正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历史事实对待党史》，《参考消息》1979年10月1日。
- [18]《共同社报道 中国平静地庆祝国庆节》，《参考消息》1979年10月2日。
- [19][22]《党史陈列 重新开放情况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号197903608010027。
- [20][21]《广大群众和国际友人踊跃参观“党史陈列”》，《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4日。
- [23]《文汇报》1981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 朱亚光）